

乡村社会记忆的功能转向及其思考^(*) ——以徽州历史档案为分析对象

○ 杨雪云¹, 丁华东²

(1. 安徽大学 社会学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2. 上海大学 图书情报档案学系, 上海 200444)

〔摘 要〕本文借助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资本视角,以徽州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徽州历史档案为分析对象,剖析传统乡村社会记忆与文化资本的密切关系,描述传统乡村社会记忆的文化资本性质,在此基础上揭示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记忆的经济资本转向及其具体表现,并从中获取有关合理利用徽州历史档案、适度开发乡村社会记忆等方面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社会记忆;文化资本;经济资本

转型期乡村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作深入探讨,而对转型期乡村社会记忆的变迁进行考察,是探究乡村社会性质的有效途径之一。

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乡村记忆正受到快速变迁的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在很多村庄,昔日自然形成的村庄格局正在被打破,充斥于日常生活的仪式习俗正日益被淡忘,人与人之间经世沿习、朴素感性的处世之道正在为理性化的现代交往原则所替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带有乡土气息的社会记忆正悄然发生变化,其文化规约、社区认同的功能日渐淡化,与市场对接、获取经济资本的功能日益凸显,乡村社会记忆正经历着从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的转向。这一转向过程中不少传统记忆渐趋弱化乃至丧失,与此不同,徽州社会记忆转向伴随着历史与今天的有机联系,过去与现在的全面融合,其独特之处耐人寻味,那么徽州社会记忆在当下社会转型期发生了何种变迁,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它能给我们带

作者简介:杨雪云(1969—),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丁华东(1969—),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学系教授,社会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批准号 10BTQ040)与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新农村视阈下的安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困境与出路”的研究成果之一。

来哪些启示?

本文借助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资本视角,以徽州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徽州历史档案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徽州乡村社会记忆特征及其运作机制的解读分析,对以上问题作出探讨。

一、传统乡村社会记忆的文化资本质性

(一) 文化资本的生成离不开社会记忆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展开批判性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它分为三大形态,即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和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指人们通过在一特定的环境中长期熏染,凝聚于身体,渗透于精神的知识、技能、素养、品味,它反映的是特定环境中的人的综合特质;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是指以物的形式呈现的文化资本,如书籍、建筑、工具等等均属此列,因为所有物的创造均离不开人,所以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也可以说是人的内在素养的物化;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则主要指在集体的层面,对个人所存有的身体性文化资本的价值予以正式承认的规则或方式,它凸显的是特定社会环境对特定素养的认同与尊崇。以上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之间并非截然分立的,而是贯通交汇,融于一体。

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的理解离不开对他的另一重要概念“场域”的理解。所谓场域,即是人们身处的、对人不断产生影响同时也为人的行动不断形塑的特定环境,“它是由一些具有共同生产物、价值观、思想、制度、组织、规则的人员组合而成的多元复合体”。⁽¹⁾“文化资本”并非抽象之物,它总是和特定场域联系在一起,其具体特质总与特定场域密切相关,因此,“人们之所以还要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资本’进行区分,主要是因为每一种形态的‘资本’只有在创造出这一‘资本’的特定场域内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固有效用。”

徽州社会的文化资本是徽州人在徽州这一特定场域创造出来的,有其鲜明独特的地域特色,而这一特色的形成与展现和徽州地区独特、系统的社会记忆息息相关。“社会记忆是指人们将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²⁾它是一个动态系统,既包含对过去社会信息的记载,也包括信息的提取,即记忆在当下社会中的解读、传递与操演。如果以具体形态来划分,社会记忆主要包括器物记忆、制度记忆和观念记忆。

徽州有着中国其它乡村无与伦比的历史档案,它们以自身的丰富与完整为徽州社会保存了一份鲜活生动的有关过往社会生活的全景图。

在中国地方区域遗留下来的历史文书档案中,徽州文书档案占有三个之最:一是年代跨度最长,前后跨度达748年;二是种类最多,现存种类达179种;三是数量最多,现存总数至少达23万卷、件。档案中既有大量的器物图片资料,也有制度的原始文本,徽州历史档案是徽州器物、制度、观念社会记忆的总汇集。

文化资本作为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不管其以器物、制度还是身体的形态出现,其生成均与社会记忆有着必然的联系。

首先,文化资本非速成之物,它的生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需要数代人的传承与积淀。每一件器物、每一项制度以及场域内对人的某种精神气质的集体认同与推崇都蕴含着人们对当下生活的理解与阐释。然而,“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3]由于徽州历史档案使徽州人“对过去的了解”全面而细致,为徽州文化资本的积累提供了丰富独特的素材与养分,正是在此基础上,徽州人经世累积的文化资本不仅丰富精致而且富有地方韵味。

其次,社会记忆的连贯性对于文化资本的生成、积累至关重要。生成于特定场域的文化资本是场域内的行动者长久互动体验、反复评价选择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的秩序化、社会记忆的连贯性对于文化资本的生成积累至关重要。

徽州多山,“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这为徽州社会记忆的积累与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尽管如此,徽州社会并非世外桃源,历史上一些大的动荡也给这一地区带来严重影响,其社会秩序也曾一度遭受很大破坏,但徽州人对谱牒的撰修一贯重视,“三世不修谱为不孝”成为徽州人的普遍理念,“三十年一小修、五十年一大修”成为徽州人的普遍习俗。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每一次战乱过后,徽州人首先关注的是通过重建祠堂、重修族谱修复被战乱打断的社会记忆,正因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徽州社会记忆虽经战乱遭受严重破坏,但仍能在最大程度上得以修复,保持其连贯性。

徽州清晰连贯的社会记忆、完整丰富的文化遗存造就了徽州文化资本的深厚底蕴,这不仅从徽州器物所渗透的人文特色,也不仅从徽州制度规则所涵蕴的共同体意识,还从徽州人的自律、自省的群体气质中得以彰显。

(二) 社会记忆的传承离不开文化资本

社会记忆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总是发生于特定环境,即布迪厄所说的具体场域之中。只有那些有机会被不断唤醒、反复提取的记忆才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一遍遍被反复操演,从而得以更为完整地传承。

然而,场域内的事件纷杂繁多,为什么是这些事情而不是别的事情被记忆?换句话说,人们依据什么认定有些信息是有价值的、值得记忆的,并在日后的行动中反复实践从而成为特定场域内人们的行为特征?布氏的文化资本概念为我们从新的角度探究社会记忆在特定场域内的传承机制带来了启示。

由于社会记忆是“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全过程,因此,在生活实践中,社会记忆是一个动态系统,不仅存储于人的大脑和历史档案里,它还体现在社会行动中,寻常生活中的仪式、表演、冲突、合作等等无不蕴涵、透射着丰富的社会记忆,我们甚至可以说,“社会记忆实在就是社会行动。”^[4]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器,完全受环境的宰制,它有着一定的选择能力,选择的依据在于特定场域内文化资本的具体内容及其特质。每一场域内都有着自己普遍流通、行之有效的文化资本,对这类文化资本的积累,无论是以物的、制度的还是身体的形式,均能给行动者带来更多地位与声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资本成为连接人与环境关系的桥梁,它对人的行动具有引导作用。

作为徽州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徽州历史档案卷帙浩瀚,似乎是事无巨细皆有收录,但事实上貌似繁杂的记录一直围绕其中轴与核心,那就是徽州人所推崇的契约精神、宗族教育、精致生活等等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本。

徽州社会记忆有着其它乡村无与伦比的系统性与连续性。在缺乏现代高科技信息存储技术的年代,文本无疑是容量大且存储时间长久的信息储存手段,这一手段在社会记忆的存储方面可以说被徽州人运用到了极致,因为“他们知道言谈举止的短暂与虚无,所以他们宁愿相信纸砚和笔墨,用他们琐碎到事无巨细的文字记录下历史的真实风貌”。徽州历史档案的具体形态包括土地买卖契约、租佃文约、合同文书、谱契簿、租谷簿、宗祠簿、典当文约、卖身契、税契凭证、推单、赋税票据、黄册底籍、鱼鳞图册、土地号簿、户领坵册、会簿、借券、任命状、试题、兰谱、信札、诉讼案卷、旌表批文等等,记录并反映了地方基层社会与民众生活的状态,大到州县,小到图甲、个人,都有比较完整的各方面的文书档案。公务文书有州县、县政诸如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鳞册;私人文书有徽州大小宗族的世系递嬗、宗族教育、科举状况、土地积累、管理经营、宗祠创建、族产管理、与官府和地方其它家族的关系等;还有更多涉及徽州平民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各种会社、风俗习惯等日常生活的记录,详细到每家每户,有的具体到个人。^[5]如此缜密细致的文本记录,前后贯通、纵横交织、相互补充、彼此应和,形成徽州纵深绵延的社会记忆,其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徽州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则,这不仅为徽州人追忆过往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素材,也为徽州人不断提取反复操演这些观念与规则提供了明晰的依据,而这又进一步让这些观念与规则深深地镶嵌在集体的记忆里,成为场域内稳定的生活理念与价值取向。

徽州人在做人上崇尚诚实守信,道德良善;在制度上,徽州人崇文重教,讲求契约与规则;这样一种为人做事的准则决定了徽州人对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偏好,他们创造的建筑与器物多倾向于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除满足人的功能性需求外,更注重寄托生活意义,表达生命反思。徽州人对以上文化资本的偏好,使那些与此理念相应和的社会记忆被反复提取、操演并随之得以自然传承。

(三) 传统乡村社会记忆的文化资本特征

以上对传统乡村社会记忆与村庄场域文化资本二者之间关系的分析表明,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记忆弥散于乡间,凝聚于一切可能的载体中,透露出文化资本的特征,其功能具体表现在对人的文化规约,对村庄乡土人文气息的营造,以及引领乡民对生活意义、生命价值的追索与体验。这一点,在传统徽州社会得到

更为充分的体现。

徽州以商著称,应当说追逐利益是商人的共同目标,然而,从徽州历史档案来看,它更多地不是记录与鼓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强调与颂扬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

徽州历史档案中有关徽商信义为本处理经济关系的记录不胜枚举。明代歙县胡仁之“贾嘉禾,年饥,斗米千钱,同人请杂以苦恶,持不可。”^[6]清代婺源朱文炽“尝鬻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牙侩力劝更换,坚执不移。屯滞二十余载,亏耗数万金,卒无怨悔。”^[7]

即便在危困时刻,义利难以两全时,他们也往往会毫不犹豫地舍利而取义。清代祁门商人汪应干,“有海阳客携千金寓其家。顺治己亥,祁有寇乱,客遁去,应干为贼所执,以刃索金,干顾其子曰‘趣取吾所有来。’其子知其意,出家货付贼得免。”^[8]明代祁门马禄“长客常州,受友人寄金百余,有同旅盗金亡去,禄秘不言,罄已货偿之。已而盗败,得所寄金,友人始知之。”^[9]

徽州历史档案对以上忠义之士的记载既是记忆的存储也是价值的认同与弘扬,更是借助社会记忆导引人们行动的方向。在徽州,“信义服人”,成为徽商“营谋渐裕”的普遍途径,^[10]“其经营团体是以实现成员道德上的和谐融洽为根本的价值取向,而不是以赢利为主要目标,其团体内部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道德关系,而不是各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契约关系。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人们很难接受商业制度下那种唯利是图的经营思想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关系。”^[11]

深厚久远的社会记忆不仅导引着徽州人的经济行为,即便在更为私人化的消费行为中也起到明晰的规约与引领的作用。

徽商因商而富者人数众多,但俭朴节约的生活方式在徽商中却蔚然成风。歙县一带“大富之家,日食不过一禽,贫者盂饭盘蔬而已。城市日鬻仅数猪,乡村尤俭。羊惟大祭用之,鸡非祀先款客,罕用食者,鹅鸭则无烹之者矣!”^[12]

生活节俭的徽商,在读书教育、公益事业等文化消费上却又显示出大方豪气的一面。他们通过经商积累一定财富后,不惜重金建学馆、办义学、设书院,投资文教、培养子弟,以尽可能让更多的子弟入学就读。徽州人对教育的重视成效显著,仅依嘉庆《两淮盐法志》中的《科第表》所列,从顺治二年到嘉庆十年(1645—1806)160年间,徽商子弟登科者256人,其中,进士85人,举人116人,贡生55人。”^[13]徽商子弟登科及第者数量可观由此可见一斑。

传统徽州强烈明晰的社会记忆,造就了徽州人重视过去、向村而生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态度,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商帮像徽商这样如此关心公益事业,他们广置族田、义田,救济本族或家乡穷人,这不但使行动者在场域内深孚众望,累积丰厚的文化资本,而且,这一精神潜移默化,对生活世界形成深层浸润,最终造就了徽州场域的独特意蕴及徽州人的群体气质。

无论是徽商的经商致富、衣锦还乡,还是徽官的各地任职、荣归故里,一次一

次反反复复,无一不是信息的进与出、吐与纳。徽州社会记忆就是在这种多种信息交汇、新旧理念碰撞的环境下展开的,这是一个信息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过程,也是一个信息辨析、选择与重构的过程,它伴随着记忆与遗忘的互动、突显与遮蔽的交替、文本书写与意义诠释的互融互构。在这样的环境里,同化与顺应不仅是徽州社会记忆存储与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实际上已全然成为徽州社会记忆本身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间的这一自然关系与乡村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民俗民德、人际关系等交融契合,形成徽州乡村社会核心价值的稳定性与自治性。不过,“自治性不意味着超稳定结构和一味守成,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很强的历史适应性和形式灵活性:在变迁中吸纳,在同化中变异。”^[14]

二、转型期乡村社会记忆从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变

传统乡村社会记忆与文化资本之间彼此融入、互构共生关系在当下社会转型期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话语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话语要求之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深刻而且是全方位的变化,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是社会记忆变迁及其功能的经济转向,作为徽州社会记忆的重要形态,徽州历史档案在社会转型期从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功能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徽州历史档案在促进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功能表现。徽州历史档案在促进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功能体现在从宏观到微观,从物质到精神等各个层面。首先,徽州历史档案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旅游资源,是一种高品位的人文景观。对于许多游览者而言,参观徽州历史档案展览与观赏古牌坊、古民居、古桥梁等徽派建筑一样起到怀古思今的功效。

其次,旅游是一种文化体验与精神享受,因此,就旅游资源而言,“意蕴”至关重要。徽州历史档案为徽州保存了久远丰富的社会记忆,徽州的生活理念与价值取向经数百年的浸润、发散,体现在人、在物、在人与人及人与物的关系中,时时、处处,有形、无形,营造出徽州独特的意蕴。这种给人触动、引人深思同时又能给人带来精神疗养的“意蕴”恰恰是众多乡村游的崇尚者所极力追求而在别处又难有所得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古村落旅游的一个重要依托是古村落的文化“意境”,^[15]显然,凭借当今的技术与材料,仅从外形上仿制某些建筑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缺少经久绵延的记忆,失去与过去生活的联接,这种“意境”却是任何高精专技术都难以营造与复制的。

此外,理想的旅游产品往往结构合理内涵丰富,但受地理及人文各方条件所限,不少旅游地很难达到这一点。徽州清晰绵延的社会记忆与徽州的秀美山色、人文积淀相得益彰,有效地将徽州的习俗风尚、社会历史、精神气质交织融合,拓宽了徽州的旅游内涵,丰富了旅游形式,使游客既能欣赏徽州的青山绿水、田园风光,又有机会领略浸润于当地居民日常习俗、饮食娱乐乃至方言俚语中的古朴生活方式,更能通过徽派建筑装饰、字画楹联领悟到渗透其间的勤勉节俭诚信伦

理以及进取向上的精神追求,从而使游客获得从感官到精神全方位的体验与触动。

其二是徽州历史档案在推进传统产品开发中的功能表现。徽州历史档案的详实记录有效地延续了传统产品的传承,同时,传统产品与徽州社会记忆的密切联系又进一步触发、拓展了市场对传统产品的需求与热衷。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各种传统手工产品众多,这些传统手工产品既是日常生活用品,同时又是文化艺术产品,凝聚着不同地区人们的社会历史、风俗习尚与审美取向,体现与承载着各地久远丰富的社会记忆。然而,由于传统产品的生产工艺仅仅依赖代际间的口耳相传,缺少文字记载,随着科技的进步、机器生产的普及以及人们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的变迁,不少传统手工产品已经失传,更多的传统手工技术濒临灭绝。

徽州历史档案保留了徽州社会完整丰富的社会记忆,使徽州诸多传统产品如徽墨、歙砚、徽漆、纸笔、木雕等,均能够依据原始档案研究开发,继承发扬,创造新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徽州茶、丝、漆、木、竹、瓷土等土特名产,也可以从历史档案中徽商的经营策略、经营项目中寻求新的发展思路,打开更为广阔的市场,实现更多经济效益。除此之外,徽州传统文化产品蕴含着丰富久远的社会记忆,这恰好应和了现代人追念往昔的怀旧心理,从而由此触发、拓展市场对传统产品的需求与热衷。

其三是徽州历史档案在建构社会关系、动员社会力量招商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表现。历史上,徽商注重乡族情谊,有聚族经商的习惯,在经商过程中资本通融,信息互享,“以众帮众”,在经营中自然结成徽商网络。通过庞大周密的徽商网络,徽商们彼此交流商业信息、共同处理公益事业,力量的集聚与整合不仅使徽商势力得以加强,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地域市场的融合。

时至今日,尽管往日的徽商网络早已今非昔比,但清晰绵延的社会记忆使徽州注重乡族情谊的传统得以传承,通过族谱、利用族人等血缘关系招商引资成为徽州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徽州人利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网络引进了一批民间资本,办起了许多小企业。

不仅如此,依凭徽州历史档案,借助徽州这一文化平台传播徽商精神,打造“新徽商”,成为安徽省政府吸引中外客商广开投资渠道的重要举措。创办于2005年的中国国际徽商大会是安徽省主办的综合性经贸盛会,意在弘扬徽商精神,展示安徽风貌,促进招商引资、贸易洽谈。近几年来其知名度不断提升,已经成为安徽省品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对外开放标志性平台,为安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以上徽州历史档案在当代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展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实践中的不同运作模式,尽管形式不同,实际上都是对社会记忆的挖掘与运用,展示出社会记忆从文化功能向经济功能转化的具体路径。

三、乡村社会记忆资本转向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

首先,社会记忆的资本转向使乡村社会记忆与文化资本原有的互构共生关系被打破,乡村社会记忆传承日益偏离原有的脉络及逻辑。

尽管传统乡村社会记忆的传承与文化资本互构共生相得益彰,但社会记忆的经济资本功能在传统乡村也并非全新的事物,只是传统乡村社会记忆更多展现的是文化资本的显功能,其作为经济资本的潜功能被抑制。乡村社会记忆的资本转向激活了这部分因抑制而沉睡蛰伏的乡村记忆,同时也使一些原本鲜明活跃的乡村记忆渐趋淡化乃至消解。

传统乡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建立在“熟人社会”礼义诚信的基础之上,必要时,人们也会借助立字画押等现代理性行为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只不过这类行为在传统乡村社会既非主流更非常态,既便是在徽州这样的契约社会,它的存在也仅限于特定的领域。今天,伴随着乡村社会记忆的资本转向,乡村社会原本沉睡蛰伏的记忆被进一步激活,理性选择成为适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普适准则,利益考量成为主流价值取向。

在激活部分记忆的同时,社会记忆的资本转向也消解了一部分传统的社会记忆。与徽州不同,我国绝大多数的乡村记忆缺少徽州历史档案这样系统缜密的文本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多次运动,乡村宗祠、家庙、族旗、楹联等多被销毁,乡村社会记忆的物的载体也几近湮灭,因此,对于中国多数乡村而言,乡村社会记忆呈现出人格化特征,乡村故事、传说、仪式等多通过口耳相传的模式传承,这在村庄相对封闭、文化资本备受尊崇的传统社会尚可维持,在村庄走向开放、人员流动普遍、经济资本成为普遍诉求的情境下,那些不能在短时期内有望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社会记忆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淡化遗忘,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世界,经久绵延的传统乡村社会记忆历经市场大潮的淘洗日渐模糊。

其次,乡村社会记忆资本转向引发乡村场域的蜕变。资本形态和其形成的特定场域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布迪厄如此论述二者之间的关联“因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即是一种仅仅在它被生产和再生产的领域中存在和生效的能量,所有与阶级相关联的资产价值和效度都是由每个领域中的特定法则给予的。”^[1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社会记忆的资本转向改变了村庄场域内的原有法则,与之伴随的则是乡村场域的全面蜕变。

对于场域内的行动者而言,社会记忆绝非可有可无的东西,“当他们失去目标的时候,过去给与他们方向;当他们在外漂泊之时,过去给与他们归属;当他们绝望的时候,过去给与他们力量之源。换言之,记忆是一种文化规划,它导引着我们的意向,设定着我们的心境,指导着我们的行为。”^[17]社会记忆不但是理解当下生活的依据,也是引领未来生活的资本,它通过赋予行动者核心价值规约行动的界限,昭示生活的意义。

在传统乡村社会,“深刻的社区记忆必然造成长长的传统社会关联链条和

以这一社会关联链条为基础的一致行动能力。”⁽¹⁸⁾ 长长的社会关联链条表现为乡村场域内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结、错综有序的人际关系,一致行动能力则表现为集体记忆对成员产生的强大约束力,这约束力来自于成员对社会记忆的存储与认同、对场域内特定文化资本的崇尚与追求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内而生的自律自省。乡村居民的这种内在品质、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状态与乡村的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成为乡土社会的生成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记忆不仅是滋润乡土社会的养分,更是构成乡土社会的主要成分。

徽州地区独特的人文气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以文本形态记载传承的系统社会记忆,强烈清晰的社会记忆既是徽州吸引资本的条件,也是其在适度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保持乡土本色的原因。

相反,那些社会记忆不够强烈系统,并且仅以人格化形态存储传承的乡村,社会记忆与经济资本的密切联系很容易使村庄为经济理性所主宰,经济资本越来越多地成为村民价值评估的通行乃至唯一标准,传统社会记忆在经济效益的兑现过程中逐渐淡化甚至断裂。失去传统记忆的引领,新的成熟现代理性又尚未完全建立,村庄整个陷入既缺乏本体性价值又缺乏社会性价值的迷茫状态,“在缺乏本体性价值又缺少社会性价值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就不再有道德和信仰的力量来约束私欲的膨胀,就不会有长远的预期,就会成为一个短视的没有前途和希望的社会。”⁽¹⁹⁾

四、徽州社会记忆资本转向带来的思考

社会记忆积累传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选择与重构的过程,因此,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为了更好地适应和发展,对传统社会记忆作出取舍,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取舍与适应绝不同于全盘抛弃,而理当是基于自身地方特色的收放有度、兼容并蓄,在这一点上,徽州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与一些地方舍弃社会记忆的精神传承、极力迎合市场的做法不同,徽州社会记忆在与市场对接的过程中显现出很强的柔韧性,柔是指它的不凝滞、不倦怠,顺时应变;韧是指它的有恒常、有坚守,变而不离其宗。徽州秉承自己的社会记忆,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前提下适度顺应市场经济,依据自身条件寻求与市场的对接,这使徽州社会记忆在资本转向过程中,彰显出自身特色,这特色本身又进一步成就了徽州的深远“意境”,为徽州社会记忆的资本化进一步创造了机遇。徽州社会记忆资本转向的途径与表现为其它地区提取、善用,及保护乡村社会记忆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不仅如此,作为徽州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徽州历史档案在社会记忆的资本化过程中,发挥自身优势,将社会记忆适度糅合到获取经济资本的诸多实践之中,既提升了旅游品位,又拓展了传统产品同时也通过建构与动员各种社会关系网络提高了招商引资的成效,徽州历史档案走出书斋,通向市场,在运用与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中保留社会记忆,在资本增值的过程中传承记忆,使历史档案在与

现实的勾连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无疑在保护、开发及善用历史档案方面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启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对徽州历史档案、徽州社会记忆的开发利用如同对其任何珍贵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样,必须开发有度、利用有节,开发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绝不可完全为经济理性所主宰,急功近利搞掠夺式开发——能获利的就拼命开发,不能获利的就任其自生自灭——如果那样的话,传统社会记忆将消散于无形,乡村人文气息将无处寻踪,最终,社会记忆的经济资本功能也将难以为继。

注释:

- (1) 朱伟钰《资本的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解析》,《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 (2) 孙德忠《社会记忆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 (3) [4] 纳日碧力戈《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 (5) 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 (6) 《大泌山房集》卷73《胡仁之家传》。
- (7) 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
- (8) 道光《安徽通志》卷196《义行》。
- (9) 康熙《徽州府志》卷15《尚义》。
- (10) 《婺源县采辑·义行》,民国抄本。
- (11) 洪璜《儒家经济伦理与徽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5年第1期。
- (12) 《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
- (13) 方竞《从徽商的消费形态看传统社会商人的历史命运》,《合肥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 (14) 朱士群、李远行《自治性与徽州村庄》,《中国研究》2006年春季卷。
- (15) 黄安民、李洪波《文化生态旅游初探》,《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
- (16)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 (17) Schwartz B. Memory as a Cultural System: Abraham Lincoln in World War II.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pp. 212-213.
- (18) 贺雪峰、全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合法性》,《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 (19) 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书 缘)